

共同富裕背景下减税 对东北地区政策效应分析

曹 阳¹,任希和²

1. 吉林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吉林省财政金融研究基地,吉林 长春 130012;
2. 西藏日喀则市定结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西藏 日喀则 857099

[摘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为了评价政策的运行效果,本文从宏观层面,通过对税收、GDP、固定资产投资、就业数据建立VAR模型,得出税负变化,到第四季度才会降低GDP增长率,3个月内使得固定资产投资增加,随后降低固定资产投资,一定时期后几乎不再产生影响。微观层面,以东北三省上市公司为例,得出税负降低在三个月内提高营业收入增长率,在半年内使净资产收益率降低,一年内对应收账款周转率没有明显影响。借此本文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调整东北地区税收分成比例,给予行业财税优惠政策,优化营商环境的建议,为实现共同富裕,振兴东北经济建言献策。

[关键词] 共同富裕;减税降费;VAR模型;PVAR模型;振兴东北

[中图分类号] F81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537(2022)06-00038-10

DOI:10.16130/j.cnki.12-1434/f.2022.06.011

Analysis of the Policy Effect of Tax Reduction on Northeast 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mmon Prosperity

CAO Yang¹, REN Xi-he²

- (1.Jil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lin Provincial Finance Research Base, Changchun Ji lin 130012;
- 2.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of Dingjie County, Shigatse Tibet 857099)

[Abstract]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posed,

[收稿日期] 2022-12-15

[基金项目] 本文系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吉林省减税降费政策效应评价研究”(项目编号:2022C42)、吉林省教育厅项目(项目编号:JJKH20210140SK)和吉林财经大学校级项目(项目编号:2022YB009)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1.曹阳(1985—),女,汉族,吉林省长春人,吉林财经大学税务学院讲师,博士后。研究方向:财税政策与税务管理。

2.任希和(1977—),男,汉族,吉林省长春人,西藏日喀则市定结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研究方向:经济体制改革。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the modern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Recently, the state has introduced a series of policies to cut taxes and fees.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operational effectiveness of the policy,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VAR model based on the data on tax, GDP, fixed asset investment, and employment. It concludes that the change in tax burden only reduces the GDP growth rate in the fourth quarter, increases the fixed asset investment within three months, then reduces it, and after a certain period, it almost stops having an impact. At the micro level, taking listed companies in the three northeastern provinces as an example, it is concluded that reducing the tax burden increases the operating income growth rate within three months, reduces the return on net assets within half a year, and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accounts receivable turnover rate within one year. In this way, this paper proposes to adjust the tax-sharing ratio in the Northeast, give preferential tax policies to the industry, optimize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offer suggestions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and revitalize the Northeast economy.

[Keywords] common prosperity; tax and fee reduction; VAR model; PVAR model; revitalizing the Northeast

一、引言

自 2016 年 5 月全面营改增以来,国家陆续推出了一揽子减税降费税收优惠政策。中央本着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的精神^①,着力减轻企业负担。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显示全年减税降费约 5500 亿,2018 年全年减税降费 1.3 万亿^②,2019 年全年减税降费 2.36 万亿,占 GDP 的比重超过 2%,拉动全年 GDP 增长约 0.8 个百分点^③,2020 年全年新增减税降费超过 2.5 万亿^④,2021 年全年新增减税降费超过 1 万亿^⑤,2022 年截至 9 月 20 日,全国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超 3.4 万亿元^⑥。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近年来,中央多次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并陆续推出了一系列的相关文件(国发〔2016〕62 号,中发〔2016〕7 号)。2020 年 7 月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考察时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东北振兴战略,加快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实现东北的全面振兴离不开财税政策的支持。首先,从增加地方政府财力角度讲,地方政府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效用,做好“六保”“六稳”工作,做好民生工作,有利于地方政府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为发展创造稳定的局面,实现改革、发展、稳定。其次,从产业发展角度讲,降低税负有利于降低企业成本,使企业将节余资金按照调结构的导向,投向企业转型升级,优化东北地区的产业结构。并且实施特定行业的税收优惠,可引导南方优质企业北向发展,带来产业、人才、资金等流动,整体上提升东北企业水平。从营造创新创业环境角度讲,税负的降低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激励更多的人参与创业,增加经济活力,留住人才、引来人才。效用制定政策发展产业,加快形成特色鲜明的产业和产业集群,形成稳定的经济增长点,同时增加就业,有效控制人才流失和企业外流。最后,从优化营商环境,提高区域竞争力角度讲,不断优化税收、市场监管、消防等双管部门服务意识,

继续实施银税互动,有效解决中小微企业贷款难问题,促进地方经济发展,逐步转变人们投资不过山海关的传统观念,为实现共同富裕的财税政策建言献策。

针对当前经济发展阶段,减税降费的主要目标锁定在降成本、调结构的供给侧(高培勇,2019)。从国家、企业和消费者这三方来看,减税降费政策的落实,显然国家让利于企业是真实有效的,并且多次表明税负只减不增。但减税降费是否真正做到了市场主体的“主观有感”,达到企业增利、个人增收的“客观有效”(杨雷鸣等,2020),目前仍有待学术界论证。

二、文献综述

减税降费是我国近年来采取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手段,是减轻企业负担,宏观稳增长、保就业的重大举措^⑦。学术界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方法,对营改增的效果,及其对宏观经济发展和微观企业行为与发展等方面进行了广泛分析,得出了一系列结论。

围绕营改增本身效应包括营改增产生了明显的分工效应、价格效应和行业效应。营改增后,由于服务业在中间的扣除,有效推动了跨地区的分工(范子英、彭飞,2017);通过测算模拟(倪红福等,2016)和投入产出法(樊勇、姜辛,2020)可以得出营改增从整体上降低了行业价格(成本),减轻了企业负担,但也存在营改增初期某些企业税负不降反增(潘文轩,2013);部分学者对营改增于房地产业(彭晓洁等,2015)、运输业(王玉兰和李雅坤,2014)、服务业(孙正和陈旭东,2018)以及带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李永友和严岑,2018)的行业效应进行了评估。

减税降费的减负效应在宏观层面明显,但对微观企业流转税负影响并不明显。

宏观层面,减税会促进经济增长(Ferede & Dahlby, 2012; 王晓品等, 2021),并降低了多数行业的税负(胡海生等, 2021);增值税降税率的微观效应主要针对上市公司运用双重差分(DID)类方法(董根泰, 2016)或回归类模型(童锦治等, 2015),得出营改增对公司流转税税负并无显著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双重差分方法由于受模型方法限制,需要用试点与非试点地区或东西部地区这种体现政策差异化执行情况进行研究,因此这类方法在全面营改增后并不适用。

减税对企业盈利、创新研发、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准入等方面存在正向影响。经典的方法主要运用双重差分(DID)类或回归类方法,得出减税对企业盈利能力(刘建民等, 2017)、创新研发(柳光强, 2016、陈明艺等, 2021)、固定资产投资(吕久琴和曹晟琪, 2020)、企业准入(Gordon & Sarada, 2017)、提升实体企业信心(张世敬、高文亮, 2022)等方面具有正相关的结论,并且存在一定的行业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

当前围绕全面营改增后减税降费对区域、企业同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通过实证分析效应、测度影响的研究寥寥,并且目前单独针对增值税税负对企业行业影响的实证研究存在较多错误,其原因在于,首先企业缴纳的增值税税额从财务报表中无法直接得出,因此其增值税数值来源存疑;其次,若采用季度数据,由于企业通常在某一月份集中进货,其他月份其中出货,会经常存在某几个季度增值税为0的情况,不具备增值税税负季度研究基础;最后,由于增值税是价外税,其实际负担方并非企业本身,企业在其仅垫付增值税,因此考虑企业增值税税负没有实际意义。故本文以企业整体税负为指标,时间上自2016年5月1日全面营改增后开始,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从实证角度分析税负下降带来

的影响。采用东北上市公司数据,一方面为了考察东北地区减税降费政策传导效应及长短期评价;另一方面数量和行业上均具备一定代表性,可以衡量政策对区域上市公司的总体影响。另外,选用的两种模型不需要严格的统计假设,并且方法具有问题刻画的适用性,既能客观描述减税是否带来实际感受问题,又能通过脉冲响应分析针对减税政策长短期评价,最终提出实质性政策建议。

三、减税效应研究假设及理论模型

(一)研究假设

1. 在内生经济增长前提下,一定时期内制定的税收优惠政策使得宏观税负下降,并会在短期对经济增长、就业和投资产生正向影响,但长期影响逐渐趋于0。

2. 一定时期内减税对上市公司各项能力指标(财务分析四大能力指标)存在一定正向影响,但长期影响逐渐趋于0。

(二)理论模型

1. 不含外生变量的 VAR 模型

宏观层面对宏观税负、GDP、新增就业、固定资产投资指标进行平稳检验,对不平稳的数据做对数差分或季节调整等变换,对变量做 Granger 因果检验,建立不含外生变量的 VAR 模型。由于该模型是处理多个相关经济指标的分析与预测最简便易操作的模型之一,并且能够反应出系统的动态冲击,因此适用于本文中问题描述,模型具体形式为:

$$y_t = \Phi_1 y_{t-1} + \dots + \Phi_p y_{t-p} + \varepsilon_t \quad (1)$$

$$t=1, 2, \dots, T$$

其中 y_t 是上述指标组成的内生变量列向量, p 是滞后阶数, t 代表季度, ε_t 为扰动列向量, Φ_i 为系数项。用普通最小二乘估计对模型进行估计,并做脉冲响应分析。

2. PVAR 模型

微观层面,考虑到 PVAR 模型可以巧妙地将所有变量内生化,并且可以刻画各变量及其滞后项对模型中其他变量的影响,同时适用短面板数据的优势,对于模型

$$z_{it} = \Gamma_{0t} + \Gamma_1 z_{it-1} + \dots + \Gamma_p z_{it-p} + f_i + \the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i=1, 2, \dots, N; t=1, 2, \dots, T \quad (2)$$

其中 i 表示个体, t 代表季度, z_t 为包含财务分析四大能力指标的内生变量列向量, p 是滞后阶数, ε_{it} 为扰动列, f_i 为个体效应, θ_t 为时间效应,采用广义矩法(GMM)进行估计。

四、实证分析

(一)宏观模型设定及分析结果

1. VAR 模型设定

选取税收、GDP、固定资产投资、城镇本年新增就业人员数(就业)数据,其中税收数据来源于国家税务总局官网,采用税收/GDP为衡量税负指标的最终数据,其他三项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为了数据平衡均采用季度数据,数据区间为2005年四季度至2022年二季度,同时为了体现政策的差异性,引入虚拟变量X,使其在2016年一季度前为0,2016年二季度营改增后为1。经Eviews软件操作发现,对税负指标差分后(税负变化),固定资产投资指标进行M-12季节性调整后取对数做差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GDP进行M-12季节性调整后取对数做差分(GDP增长率),就业数据换算为增长率数据后上述指标平稳(结果见表1),分别记为TAX、GDP、GT、JOB,则 $y_t = (TAX_t, GDP_t, GT_t, JOB_t, X)$, 通过Eviews软件建立VAR模型,定阶结果由SC准则显示最优滞后阶数为2阶,滞后期为20,即5年。最终建立一个5变量VAR(4)模型。

2. Granger 因果检验

因TAX、GDP、GT和JOB数据均为平稳

表 1 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名	TAX	GDP	GT	JOB
t 统计量	-9.9573	-7.6279	-3.6378	-6.5249
平稳性	平稳	平稳	平稳	平稳

数据,满足 Granger 因果检验条件,具体结果见下表 2。从表 2 可以看出税负变化与就业增长互为因果,这一点似乎与人们传统观念不相符。固定资产投资不是税收、就业的 Granger 原因,固定投资难以起到税

收增收和提高就业率的作用;GDP 也不是税负、固定资产投资和新增就业变动的 Granger 原因;就业增长也不是税负、GDP 和固定资产投资变动的 Granger 原因。固定资产投资变动和 GDP 变动的 Granger 原因,

表 2 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原假设	F 统计量	P	结论
GDP 不是 TAX 的格兰杰因	0.2021	0.8176	接受
TAX 不是 GDP 的格兰杰因	1.7465	0.1833	接受
GT 不是 TAX 的格兰杰因	1.3416	0.2693	接受
TAX 不是 GT 的格兰杰因	0.1692	0.8447	接受
JOB 不是 TAX 的格兰杰因	7.7865	0.0010	拒绝
TAX 不是 JOB 的格兰杰因	5.0449	0.0095	拒绝
GT 不是 GDP 的格兰杰因	3.4048	0.0399	拒绝
GDP 不是 GT 的格兰杰因	1.1004	0.3395	接受
JOB 不是 GDP 的格兰杰因	0.6376	0.5322	接受
GDP 不是 JOB 的格兰杰因	0.5068	0.6050	接受
JOB 不是 GT 的格兰杰因	0.0187	0.9815	接受
GT 不是 JOB 的格兰杰因	0.0645	0.9376	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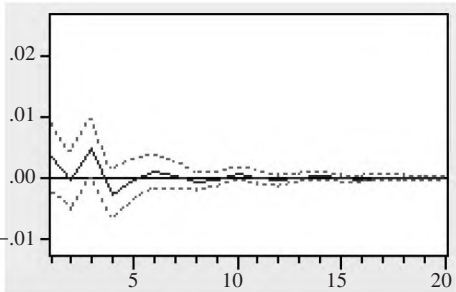


图 1 税负冲击引起的 GDP 增长的响应函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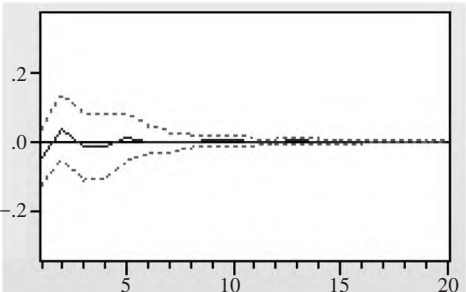


图 2 税负冲击引起的固投增长的响应函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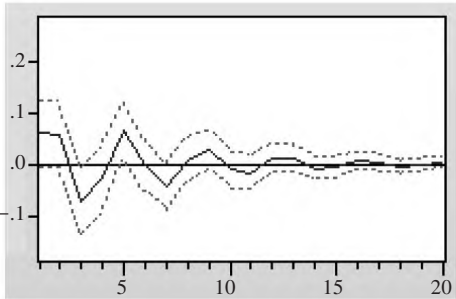


图 3 税负冲击引起的新增就业的响应函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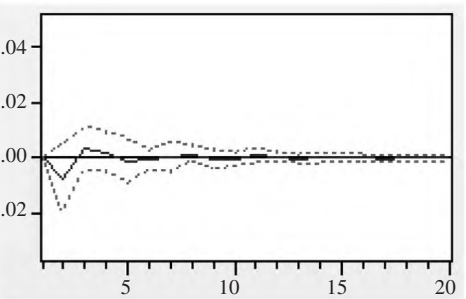


图 4 营改增政策引起的税负的响应函数

现实中加大固定资产投资有利于 GDP 的增长。

2. 脉冲响应分析

本文所选的税负差分数数据,可以理解为税负增量。从图 1 看出,税负的冲击对 GDP 在 3 期(9 个月)内产生同向影响,即税负降低,到第四季度才会降低 GDP 增长率,6 期(一年半)以后对 GDP 几乎不再产生影响。图 2 显示,税负正冲击会在 1 期(3 个月)内使得固定资产投资下降,即税负降低,短期会促使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之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减少会缩减城镇建设力度,使得固定资产投资降低,4 期(一年)以后不再产生影响。图 3 税负对就业的影响在正负间波动,因此认为其对就业没有明显影响,长期影响在 10 期后逐渐趋于 0。图 4 显示,营改增政策当期(即 2016 年二季度)没有引起税负变化,2 期内(半年)降低了税负,随后影响逐渐趋于 0。

3. 方差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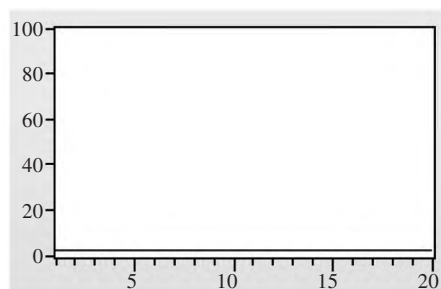


图5 GDP对税负贡献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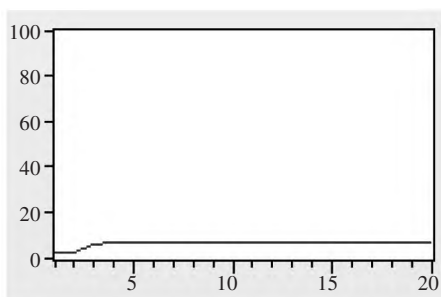


图6 固定资产投资对税负贡献率

从图 5、图 6 看出 GDP 和固定资产投资对税负冲击影响很小,分别为 1.6%(RVC(4)=1.643)和 6%(RVC(4)=6.323)左右,但

图 7 显示就业对税负冲击贡献率最大达到 20.39%(RVC(6))。而图 8 税负对就业的影响到第五期达到 16%,可见税负变动确实对就业产生一定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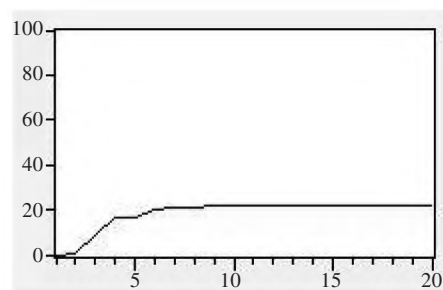


图7 就业对税负贡献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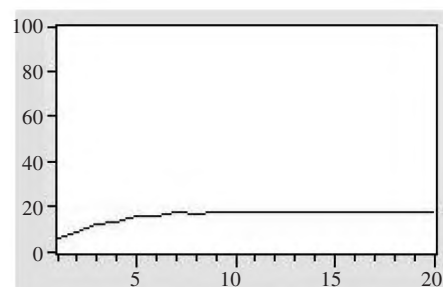


图8 税负对就业贡献率

(二) 微观模型设定及分析结果

1. 数据来源

数据源自同花顺个股财务概况中已经算出的四大财务指标数据,国泰安数据库中 30 个省上市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和合并利润表,为了保证数据的代表性和平衡性,剔除了 ST 上市公司和 2016 年一季度后上市的公司。最终选取 103 家上市公司,其中吉林省 15 家,黑龙江省 30 家,辽宁省 58 家。时间跨度为 2016 年一季度至 2021 年一季度,每个企业的每个指标含 20 个数据。

2. 指标选取

本文指标的选取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原因:(1)通过对企业涉税数据和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进行汇总整理,指标的选择依据财务稳定性代表指标,具体包括综合考虑企业税收负担状况的指标(包括税收负担率、进销项比);企业盈利能力指标(包括销售净利率、净利同比增长

率、总资产利润率、主营业务利润率、主营业务成本率、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率、净资产收益率等);企业营运能力指标(包括存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总资产周转率、成本费用率、流动资产周转率);企业成长能力指标(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净利润增长率、净资产增长率和总资产增长率);企业偿债能力指标(包括现金流量比率、资产负债比、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等)。(2)考虑到数据可获得性及便捷性,本文参照同花顺个股资料中财务概况能得到的数据信息,直接采用同花顺软件显示的上述四个财务指标中常用的相关指标。同时,为了避免重复选取指标,流动比和速动比两项仅取一项流动比,销售毛利率和销售净利率两个指标只取销售净利率。最终从同花顺数据选取的指标为净利润同比增长率、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率、销售净利率、净资产收益率、存货周转率、流动比和资产负债比。从合并资产负债表和合并利润表中计算成本费用率、应收账款周转率、总资产周转率(计算公式见曹阳等 2019 中表 1)和综合税负(本文用税金及附加与所得税费用之和除营业总收入表示,采用这一指标不包含增值税,相对合理),特别需要注

意的是,需要通过财务报表计算得出的指标在计算过程中利润表中相关数据(如营业成本、营业总收入、所得税费用等数据)应将累计数据计算成当期数据,涵盖四大能力指标及税负,共计 11 个指标,分别记为 X_1, X_2, \dots, X_{11} 。

对上述指标数据做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见表 3。从表 3 可以看出 X_1 与 X_7, X_8 存在相关性,剔除变量 X_1 ; X_3 与 X_4, X_5, X_{11} 存在相关性, X_5 与 X_{11} 存在相关性,由于 X_{11} 为税负指标,是本文重点考察的内容,为必须保留的变量,因此剔除变量 X_3 和 X_5 。 X_8 与 X_1, X_4, X_6 和 X_7 存在相关性,剔除变量 X_8 ; X_9 与 X_{10} 相关,因此只保留其中一个指标,剔除变量 X_9 。为了避免参数过多, X_6 和 X_7 只选其一,由于 X_7 应收账款周转率数据存在应收账款数为 0 情形,为避免出现分母为 0 情形,剔除 X_7 。最终,四大能力指标各保留一个指标变量,余下 X_2, X_4, X_6, X_{10} 和 X_{11} , 共 5 项指标,分别为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率、净资产收益率、应收账款周转率、资产负债比和综合税负,记为 y_1, y_2, \dots, y_5 。

3.PVAR 模型设定

模型采用连玉君(2010)提供的 PVAR2

表 3 指标数据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

	成长能力指标		盈利能力指标			营运能力指标			偿债能力指标		税负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X1	1.0000	0.0000	-0.0170	-0.0007	-0.0116	0.0326	0.3377	0.3807	-0.0177	-0.0357	-0.0251
X2	0.0000	1.0000	0.0122	0.0066	0.0163	0.0080	-0.0027	-0.0120	-0.0082	-0.0237	0.0158
X3	-0.0170	0.0122	1.0000	0.1468	0.2896	0.0520	0.0080	0.0407	0.0246	-0.0470	0.5326
X4	-0.0007	0.0066	0.1468	1.0000	0.1243	0.0587	0.0178	0.1641	0.0037	-0.0687	0.0597
X5	-0.0116	0.0163	0.2896	0.1243	1.0000	0.0461	0.0015	-0.0555	0.1022	-0.1183	0.1923
X6	0.0326	0.0080	0.0520	0.0587	0.0461	1.0000	0.0157	0.1123	-0.0590	0.0685	0.0749
X7	0.3377	-0.0027	0.0080	0.0178	0.0015	0.0157	1.0000	0.2530	-0.0055	-0.0654	-0.0223
X8	0.3807	-0.0120	0.0407	0.1641	-0.0555	0.1123	0.2530	1.0000	-0.1259	-0.0075	-0.0821
X9	-0.0177	-0.0082	0.0246	0.0037	0.1022	-0.0590	-0.0055	-0.1259	1.0000	-0.4640	0.0409
X10	-0.0357	-0.0237	-0.0470	-0.0687	-0.1183	0.0685	-0.0654	-0.0075	-0.4640	1.0000	-0.0163
X11	-0.0251	0.0158	0.5326	0.0597	0.1923	0.0749	-0.0223	-0.0821	0.0409	-0.0163	1.0000

程序包,运用Stata软件实现,表4显示模型AIC、BIC和HQIC值最优滞后阶数均为2阶,即半年滞后期,由于 y_1 和 y_4 存在单位根检验不平稳情形,因此对 y_1 和 y_4 做差分处理,之后建立PVAR模型,对模型进行GMM估计,针对税负率 y_5 得到下面的脉冲响应图9-12。

表4 最优滞后阶数选择结果

lag	AIC	BIC	HQIC
1	9.41847	11.1055	10.0421
2	8.27182*	10.1266*	8.95955*
3	8.72934	10.7707	9.48872
4	11.7812	14.0317	12.6213
5	8.58867	11.0755	9.520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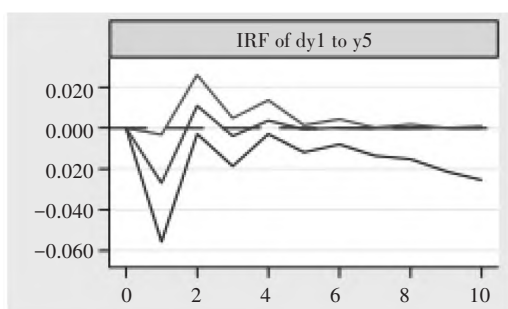


图9 税负率对营业总收入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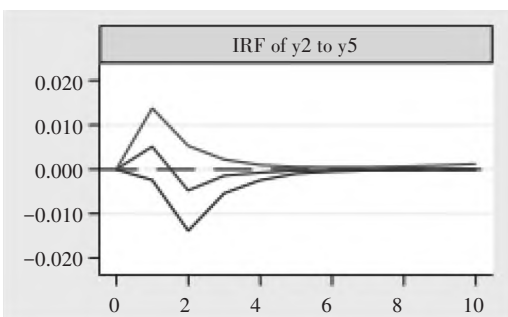


图10 税负率对净资产收益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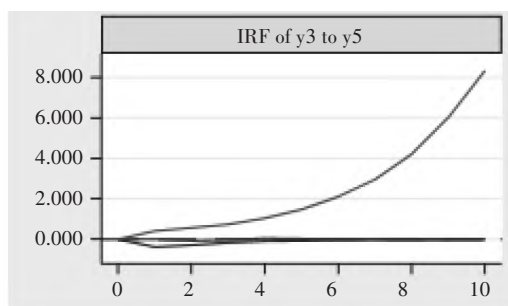


图11 税负率对应收账款周转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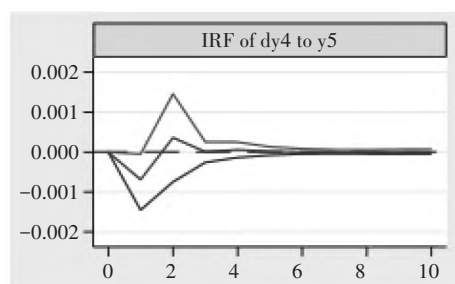


图12 税负率对资产负债比

从图9可以看出,当给税负率正向冲击后,税负增长在当期至第一期(3个月)对营业收入增长率成负相关性,说明税负增加在三个月内降低营业收入增长率,半年后影响趋于0。而图10则表明,税负增加,在三个月内使净资产收益率增长,原因可能在于税负增加,为了保障企业发展将倒逼股东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而后至半年下降,九个月后趋于0。图11显示,税负增长对应收账款周转率没有明显影响,但长期将趋于导致应收账款周转率变大,说明税负提高使企业提高了忧患意识,提高企业收账速度和偿债能力。图12表明,税负增加,在一期内导致资产负债比轻微降低,第二期该指标轻微增长,上述影响均到第四期后趋于0,表明税负率下降对上述指标约有1年的影响,原因是随着经济社会和企业的不断发展,减税降费的长期效应会被逐渐减弱,因此需要相适应的定期制定发布相关政策,并予以宣传,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五、结论与对策建议

从本文的结论可以看出,一定时期颁布的税收优惠政策使得税负下降,半年内会提高GDP、固定资产投资和就业增长率,一年半后对GDP和固定资产投资几乎不再产生影响,符合本文的研究假设1,据此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也应与时俱进,应加快政策与现实经济发展匹配度变化的协调适应性。例如随着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与之匹配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也应调高。从

微观企业发展角度来看,税负的降低在短期内起到了对企业增收的效果,符合本文的研究假设2。因此从长期看,有必要持续发布新的税收优惠政策以促进经济发展,涵养税源。同时,激发企业发展活力不应仅仅依靠税收政策扶持,需要结合财政政策并提倡多方共同努力。

自2016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发布以来,党中央领导多次视察东北地区,召开专题座谈会,说明中央对振兴东北的重视与决心。“十三五”期间,东北在经济发展、营商环境、结构调整和粮食生产安全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受地方政府债务率高,土地财政创收难以为继,体制机制、产业结构转型缓慢,人才及劳动力流失等方面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空间小、竞争力薄弱。在财税政策方面,国家给予的各项优惠政策力度较小,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可采取的优惠政策少,灵活操作度差。

建国初期,东北三省作为共和国的长子为全国发展无私地提供物质、工业和人才支持。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东北三省受地域和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因素影响,逐渐落后。随着土地出让金增幅的逐年放缓,受工资上涨、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建设等刚性支出逐年增加,地方债务使得地方政府发展束手束脚。从税收政策角度,当前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几乎是无差别的。据此,为实现共同富裕这一伟大愿景,提出以下三方面建议。

其一,财税体制上调整税收分成比例。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建议中央一定年限内对东北地区的税收分成进行调整,适当缩小中央国库的比例,合理增加省、市分成,重点增加县区国库留用比例,活化基层可利用资金,激活地方经济。

其二,税制上加大制造业及配套产业,

农林牧渔和金融行业税收优惠,降低相关行业税负。鼓励并加大力度培育东北公司上市,中央拨付专项财政资金扶持东北地区有意向上市的大中型企业,并通过财政手段给予其3-5年的一定比例税收返还;对乡村振兴、轨道客车、汽车研发、新材料等事关国计民生的基础性产业或事关国家亟需攻关突破性的产业,给予更大力度的税收优惠政策。给予东三省参与“一带一路”的企业税收优惠。“一带一路”建设为东北全面振兴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呼吁中央给东三省参与进来的企业一定年限的企业所得税优惠,帮助企业在外站稳脚跟,涵养税源,形成良性循环。为了避免发生税收虹吸现象,可以仅针对现有并且一定规模的企业,政策颁布实施后新成立的企业,不享受上述优惠。

其三,征管上提高服务意识,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干部队伍活力。为此,应在各政府部门干部任用中,优先考虑年轻干部包括女性干部和民主党派干部,并形成干部任用规章,充分发挥公务员体系工作积极性,干部有活力,工作才有突破,进而更好地服务百姓。

注释:

①李克强拍板“营改增”:必须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 http://www.gov.cn/xinwen/2016-03/19/content_5055477.htm

②2018年全年减税降费1.3万亿元,哪些人最受惠?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9-03-04/doc-ihsxnevf9717050.shtml>

③减税降费促发展 利企惠民添动能——“十三五”时期我国减税降费取得积极成效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219/n810780/c5157719/content.html>

④2020年我国新增减税降费超2.5万亿元 http://www.gov.cn/xinwen/2021-01/10/content_5578586.htm

⑤2021年新增减税降费约1.1万亿元 http://www.gov.cn/xinwen/2022-01/27/content_5670654.htm

⑥税务总局:今年以来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超3.4万亿元 <https://www.chinanews.com.cn/cj/2022/10-08/>

9868306.shtml

⑦曾金华,张雪.减税降费是积极财政政策头等大事[N]. 经济日报. 2019-03-08. http://www.gov.cn/zhengce/2019-03/08/content_5371848.htm

参考文献:

- [1]高培勇.聚焦高质量发展语境下的减税降费[J].中国财政,2019(12):1.
- [2]杨雷鸣,朱波,苏宇,杨坦.实质性减税的效应分析:基于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风险视角[J].税务研究,2020(04):22-26.
- [3]陈钊,王旸.“营改增”是否促进了分工: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J].管理世界,2016(03):36-45+59.
- [4]范子英,彭飞.“营改增”的减税效应和分工效应:基于产业互联的视角[J].经济研究,2017(02):82-95.
- [5]倪红福,龚六堂,王茜萌.“营改增”的价格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J].中国工业经济,2016(12):23-39.
- [6]樊勇,姜辛.增值税的价格效应[J].财政研究,2020(09):105-118.

[7]张世敬,高文亮.减税降费政策对实体企业信心提升效应研究——基于企业现金决策行为的视角[J].宏观经济研究,2022(07):53-64.

[8]潘文轩.“营改增”中部分试点企业税负上升的成因分析[J].中国财政,2013(15):27-28.

[9]彭晓洁,王安华,肖强.房地产行业“营改增”效应预估[J].税务研究,2015(11):37-41.

[10]王玉兰,李雅坤.“营改增”对交通运输业税负及盈利水平影响研究——以沪市上市公司为例[J].财政研究,2014(05):41-45.

[11]孙正,陈旭东.“营改增”是否提升了服务业资本配置效率?[J].中国软科学,2018(11):17-30.

[12]李永友,严岑.服务业“营改增”能带动制造业升级吗?[J].经济研究,2018(04):18-31.

[13]王晓品,贾兵,陈永富.我国减税降费政策效果评估及优化路径研究——基于TVP模型的实证分析[J].地方财政研究,2021(03):58-66+85.

责任编辑:陈宏博

(上接第 30 页)

参考文献:

- [1]李易懋.金融科技对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J].湖南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学报,2020(5):83-89.
- [2]袁康,邓阳立.道德风险视域下的金融科技应用及其规制——以证券市场为例[J].证券市场导报,2019(7):13-19.
- [3]庄雷,王烨.金融科技创新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J].软科学,2019(2):43-46.
- [4]孟娜娜,栗勤.挤出效应还是鲶鱼效应:金融科技对传统普惠金融影响研究[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20(1):56-70.
- [5]Chava S, Oettl A, Subramanian A, Subramanian K V. Banking deregulation and innovation[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3(3):759-774.
- [6]Peters M, Schneider M, Griesshaber T, Hoffmann V H. The impact of technology-push and demand-pull policies on technical change—Does the locus of policies matter?[J]. Research Policy, 2012(8):1296-1308.
- [7]王文波.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基于省域数据的实证分析[J].金融教育研究,2019(1):40-48.

[8]刘姝璠,张荣光,邓江晟.科技金融、高新技术产业与产业结构升级[J].统计与决策,2021(2):145-149.

[9]杨飞虎,晏朝飞,熊毅.政府投资、人力资本提升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面板VAR模型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16(12):18-25.

[10]宛群超,袁凌,王瑶.对外直接投资、区域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J].华东经济管理,2019(5):34-42.

[11]贾敬全,殷李松.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研究[J].财经研究,2015(9):18-28.

[12]宋丽敏.城镇化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吗?——基于1998-2014年30省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17(8):70-78.

[13]Carlin W, Mayer C. Finance, investment, and growth[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3(1):191-226.

[14]Aghion P, Griffith R, Howitt P. Vertical Integration and Competition[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6(2):97-102.

责任编辑:王 炜